

校園文化與「反學校文化」

張 人 杰

以校園文化研究的回顧為基礎，本文討論三個問題。其一，宜怎樣去界定莫衷一是的校園文化？其二，對校園文化應避免哪些誤解？其三，應怎樣認識校園文化建設和研究中很少涉及的「反學校文化」？

本文主要根據中國大陸的實況，兼及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側重社會學的角度指出：

(一)與其再去採借其他學科的結論，繼續給校園文化下一個又一個各自認為恰當的定義，倒不如認真地辨析構成校園文化的諸要素，例如校園文化的主體、結構、功能、性質等，即暫時宜將社會學的整體論研究取向擱在一邊。

(二)對校園文化的誤解，尤其見諸對它的構成要素的認識上。就校園文化的功能而言，至少有五處誤解需要予以澄清。這種誤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社會學研究的介入所致。

(三)不涉及「反學校文化」，乃是校園文化建設和研究中的一大「盲點」。「反學校文化」有三種基本形態，在本質上是校園文化中根本價值觀之異化。應為「反學校文化」正名，以有助於校園文化的良性發展和深入研究。

校園文化建設，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環，自1986年起在中國大陸引起廣泛注意。那麼，何謂校園文化呢？本文擬以校園文化定義的回顧為基礎，討論現在和今後若干年內顯得更有實際意義及理論價值的三個問題：一、宜怎樣去界定校園文化？二、對校園文化應避免哪些誤解？三、怎樣認識「反學校文化」才更為妥當？

壹、校園文化之界定

校園文化雖然是教育理論研究者和教育實際工作者所關注的課題之一，但必須承認，至今還沒有一個得到公認的定義。

在中國大陸，關於校園文化，大致上有四類表述：

一是狹義的，特指學生。這種觀點的持有者認為，校園文化是學校的一種精神生活，是學生創造性活動與潛能釋放的總和（吳修藝，1988）。

二是廣義的，認為校園文化是以學校中的主體（教師、學生及職工）為被承載體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徐新建，1989）。

三是廣義與狹義相結合的，認為校園文化在廣義上是指校園中主體的生活方式之總和，在狹義上意謂課堂教學過程以外的校園生活的存在方式（程振響，1989）。

最後，校園文化被視為「潛在課程」，而「潛在課程」是指學校的環境、氣氛和風氣，它雖不是第一類課程（列入教學計劃的課程），也不是第二類課程（課外活動），但對學生有教育作用，故可以列為第三類課程（劉佛年，1989）。

縱觀上述四類表述，便可發現它們在內涵及外延上有重大差別。這種差別的成因很多，但很可能與文化一詞涵義的不確定性有更密切關係，大概與校園文化的實驗、研究起步較遲也息息相關。

就文化一詞的定義而言，美國人類學家克魯伯(Kroeber, A.L.)等在其1952年出版的「文化：關於概念和定義的檢討」一書中指出，從1871年，即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泰勒(Tylor, E.B.)最早給文化下定義起，直到1951年，關於文化的定義有104種（司馬雲傑，1986）。另據統計，從現有的國內外研究文化的論著來算，文化的定義有200多種（姚平，1986）；1992年夏，一報告引述他人統計時稱，有關文化的定義已不下300餘種（鄭金洲，1992）；最近，有人兩次撰文提及，據統計，文化的定義現在已不下160種（孫運石，1992）。這些數據因統計的範圍和所取標準不同而有很大出入，卻清楚地顯示關於文化的定義確實不勝枚舉。我們即使不能同意有多少研究文化的人就有多少關於文化的定義之說法，可也得承認多洛(Dollot, L.)說的有理：「每個人都可以對文化作出個人的描述」（路易多洛，1987）。有鑒於此，校園文化有

不同的界定並不偶然。此外，認真地進行校園文化的建設為時不久，嚴謹的實驗也不多。簡言之，校園文化據以概念化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均顯得不足。

如果說現在給校園文化下一個定義不算為時過早，那麼，是否可以考慮另擇其他研究取向呢？譬如說，首先著眼於構成校園文化的諸要素。當然，這一研究取向與社會學中的整體論(holism)是背道而馳的。

不可否認，對校園文化現在畢竟已形成一些共識。

首先，在性質上，校園文化乃是社會大文化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屬於次文化的範疇。因此，校園文化這一為學校所特有的文化現象，既受制於社會文化，又常影響著社會文化的變遷。

已有許多調查結果足以表明校園文化深受社會文化的制約。大學校園倫理水平的演變（有如表一所示），便是一例。

表一 上海某學院在校大學生人生觀的演變、

調 查 項 目	佔被調查者總數的比率(%)	
	1982年	1989年
為國家富強及為人民造福而學習	72.1	10
為個人成名成家或為了出國	20.6	69
同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5.7	58.2

資料出處：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所編「高教信息與探索」（第21期），1989年11月15日。

這一演變，恰好是社會文化演變的縮影。據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最近進行的一項全大陸的調查表明，更多的城市青年認為，他們的人生奮鬥目標是個人的幸福和滿足，超過半數的人贊成「人應當及時行樂」的說法。「節儉」與「認真」一項，在調查中所設的20項道德品質的排序中，被排在倒數第一位。特別重要的是，調查報告的作者還指出，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道德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要力石，1993）。離開當前社會道德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一大背景，恐怕難以充分解釋大學校園內倫理水平的現狀；與此同時，就不宜籠統地說由於校園文化受社會文化的制約和規定，因此校園文化必須與社會的宏觀文化環境相適應，才能適應社會文化的發展需要。

至於校園文化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問題也不僅僅在於反覆論證確

有其影響，還在於應看到這種影響同樣既有正面的，又有負面的。因為，舉例來說，校園文化主體之一的在校大學生其本身具有的特徵，就有積極和消極這兩重性。對此已有兩份研究報告（「科學地分析」，1992；「歷史的啓示」，1990）作了嚴謹的分析。

其次，在結構上，人們一般都同意，校園文化由三個呈鱗狀迭蓋的層面所構成。這三個層面是：(一)觀念層面；(二)制度層面；(三)物質層面。人們還贊同，其中的觀念層面包含的校園文化主體的價值觀及其變化，在整個校園文化中居核心地位，它直接規定著另兩個層面，因而決定著校園文化的特徵、作用和變遷。

需補充指出的是，觀念層面包含的校園主體的意識形態、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判斷、審美情趣、目標取向等，乃是指事實上的而未必是法定的，並且是指居主流地位的而未必是共同一致的（將在下文予以討論）；就制度層面而論，它不僅包括學生守則、教師職責規定等成文的規章制度，還包括不成文的但需共同遵守的制度；物質層面主要包括物質設施、物質環境和活動形態，所承載的既是觀念層面，又是制度層面。不言而喻，現實生活中的校園文化其三個層面是難以截然分割的。可以認為，忽略了這些要點，就不易把握住校園文化的結構。

我們在此無意為校園文化問題上的共識列出一張清單，只是試圖表明，現在已有一些共識可供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與其採措哲學、人類文化學或政治學等學科中關於文化的定義，以便給校園文化下一個各自都認為更適宜的定義，倒不如先下功夫在已有共識的基礎上，去辨析構成校園文化的諸要素（例如，校園文化的主體、結構、功能、性質等），並去探討另外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校園文化與校內其他兩類課程的關係，二是校園文化與社會文化等關係），以逐步逼近目標。

貳、對校園文化的誤解與辯正

為界說校園文化，人們已作出有益的嘗試，但也常有一些不容忽視的誤解需澄清。

例如，關於校園文化的主體，現在有的表述僅僅涵蓋學生（見上文提及的第一類表述），有的表述已正確地擴及教師和職工，卻又不

明確指出學校中的領導者也是校園文化主體之一（見上文提及的第二類表述）。

在筆者看來，這兩種關於校園文化主體的限定均失之於偏頗。學校領導者的素質、領導風格等對學校「氣氛」的影響，已不斷地為國內外研究成果所證實，在界定校園文化的主體時未列入學校領導者之不妥，實乃顯而易見；將校園文化的主體僅僅限定為學生，這在理論上似無依據，且很難用這一限定去解釋校園中各種文化現象，更何況教師和學校領導者在校園文化中實際上常扮演主體角色，故而這一限定使人更無法接受。

又如，關於校園文化的功能，有兩種論述值得一提。

其一，側重宏觀層面，強調校園文化代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認定校園文化對學校所在社區有強大的呈輻射狀的影響力，確認校園文化還在陶冶著校園文化的創造者，特別是對學生有極其巨大的教育作用（肖川，1990）。

其二，側重微觀層面，強調校園文化對學生和教職員工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被提及的有認識功能、育才功能、導向功能、滿足功能、生產功能、娛樂功能、制約功能、組織功能、整合功能、「烏托邦」功能，共計為十項（俞國良，1991）。

這裡至少有五處誤解（不限於這兩種論述，也不是每種誤解見諸每種論述）：

I. 混淆了三個彼此有緊密聯繫但又有一定區分度的概念，即預期功能（通稱為目標）、潛在功能（尚未被人認識或有待於開發的功能）和實際功能（事實上取得的效應或效能，包括始料未及的）。

II. 未指明在列舉的種種功能中主要功能乃是對學生的精神有重大影響，具體地說，對學生的價值取向、行為規範、人際交往準則、審美情趣及生活方式等起著導向、激勵和制約的作用。尤其是校園文化在潛移默化之中讓學生接受教育，少有正規課程的強制性，所以能使學生沒有感到受教育而又受到畢生難忘的教育，在學生社會化過程中常比正規課程更為有效（馮思洪，1987；吳孟明，1987）。

III. 誇大校園文化的功能，因為「校園文化代表著社會

文化的發展方向」等命題缺乏普遍意義。

IV. 缺漏了校園文化在課堂教學中作用的論述。教育知識社會學（或稱為課程社會學）的研究表明，「一個社會怎樣選擇、分類、分配、傳遞和評價它認為是公眾的教育知識，既反映著這個社會的權力分配情況，也反映著這個社會的權力控制的一些些原則」（丹尼斯·勞頓，1985）。諸如「什麼知識最有用」、「怎樣傳遞知識更有效」以及「怎樣使習得之評價更可靠」等基本問題，無一不與校園文化主體的價值觀有關。教學社會學研究也證實，有效的教學與教師在班級教學中的角色觀念及學生同輩次級文化有密切關係。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校園文化具有其他教育手段所無法替代的作用，視校園文化為課堂教學過程以外的校園生活的存在方式（本文開始時提及的第三類表述），也就並不合適了。

V. 更大的誤解在於，只見校園文化的正面功能而不見其負面功能。這種情況比較普遍。

首先直接面對校園文化負面功能的，在大陸可能是俞國良。他指出：如果校園文化的「負面過於強大」，而參與校園文化創造的主體又因襲著傳統的重負，其結果會使校園文化過早地夭折，更可能由於強大的文化負面存在，使學生急功近利，從而導致文化創造上的食洋不化，產生非驢非馬的校園文化（俞國良，1991）。嚴格地說，他指出了產生校園文化負面功能的一些機制。

最近，作為瑞士代表團團長的福爾米(Follmi, D.)在第四十三屆國際教育會議（1992年9月14日至19日，日內瓦）上的發言，也不無啓示。在這次以「教育對文化發展的貢獻」為主題的國際教育會議上，他用植物從土壤裡既吸取營養，但又吸取有害寄生菌與疾病作比喻，聯想到少年兒童既可能從文化中提高自身的教養，又可能從中遭到腐蝕而走上歧途。他說：「文化既有撫育高尚人生的積極方面，又有培植仇外情緒滅絕異己的消極方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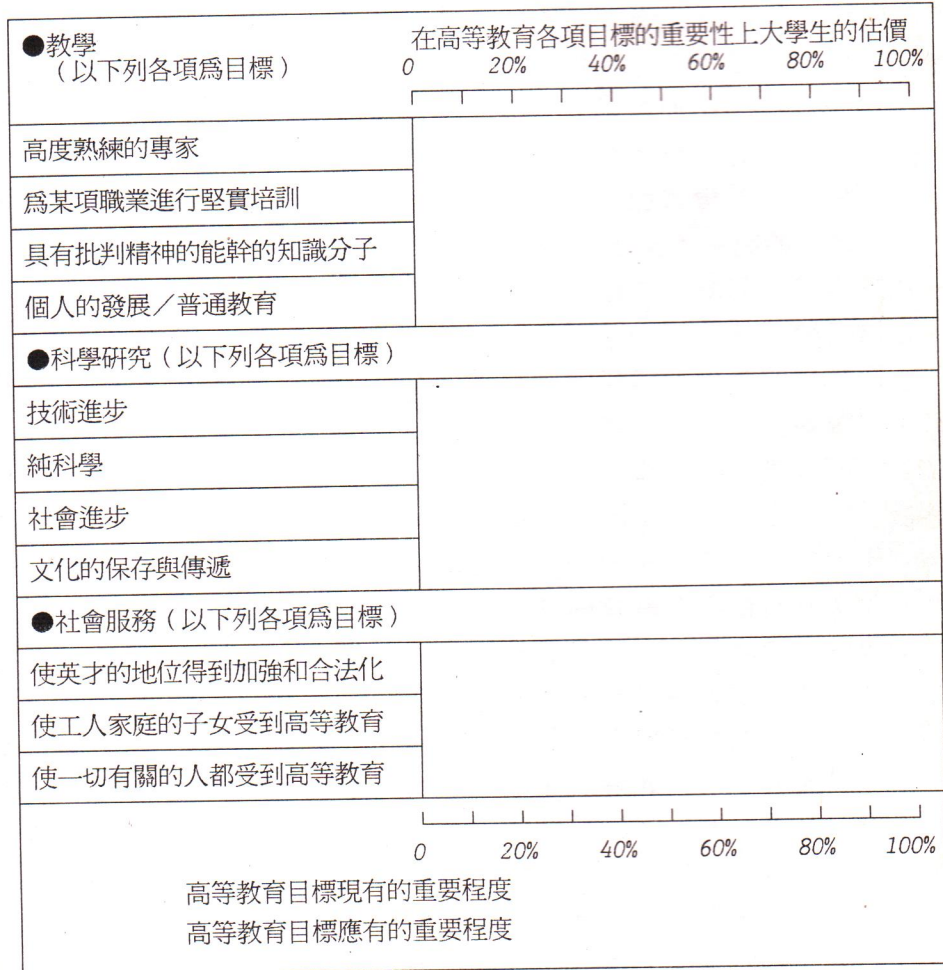
既然社會文化和校園文化都有負面，我們怎樣能設想校園是一方淨土？又怎樣能斷言校園文化是「淨化了的文化環境」（肖川，1990）？更怎樣能無視或否認校園文化負面功

能之存在？

再如，在校園文化的結構上，只見其一致而不見其差異。調查表明，根據大學生的意見，高等教育現有的目標與它應有的目標之間是很不一致的（有如表二所示）。可惜，對諸如此類的差異所進行的調查研究甚少，致使校園文化的調適和整合都受一定限制。

表二 關於高等教育目標
（在高等教育各項目標的重要性上大學生給予的估價）

（N=6670名大學生）



資料出處：「對康斯坦次湖大學的大學生之研究」，1982年～1983年。
轉引自「歐洲高等教育」（法文版）1985年第1期第23頁。

1994.3
2卷2期
教育研究資訊

然而，最大的誤解莫過於對校園文化深層問題的認識。這一深層問題便是「反學校文化」。

叁、對「反學校文化」的反思

在大陸關於校園文化的討論中，幾乎無人涉及「反學校文化」。即使有所觸及和展開，也只是將「反學校文化」歸結為次級文化（俞國良，1991）。而在西方學術界，被廣泛引用的一種表述，則是將「反學校文化」限定為「工人階級子女通過對學校內流行文化的反抗所形成的另一種文化」（載維，1989）。

我們認為，不涉及「反學校文化」是校園文化研究和建設中的一大「盲點」，對「反學校文化」已有的一些限定很有反思之必要。

大概誰也不會否認，在校園中確實存在著有悖於校園文化（取其一般涵義）的另一一些文化現象。這些文化現象概稱為「反學校文化」，並且認定其共同點在於使校園文化的核心——根本價值觀異化。它可以分為三種形態。

最常見的異化形態是，事實上的價值取向根本背離形式上的價值取向。例如，中小學實際追求的目標因受升學考試的軛制，而不得不根本背離形式上的（或稱法定的）目標，致使片面追求升學率成為中小學不少領導者及師生的實際價值取向。這幾乎見諸所有的篩選性教育系統，雖經長期和多方努力仍無法解決（張人杰，1990）。這種形態的異化，其特徵在於背離是根本的，涉及是全局的，覆蓋是大面積的（甚至包括家長），結果是往往可以形成事實上的校園主流文化之一，受反彈的則主要是形式上的價值取向。

異化的第二種形態可簡稱為對抗，即上文提及的次級或在西方學校中的工人階級子女通過反抗所形成的文化。這種形態的異化，其特徵在於從性質上看同樣是根本的背離，但與第一種異化有所不同：一方面受反彈的可以是形式上的價值取向，也可以是事實上的某種校園主流文化，另一方面，背離者往往只是某一個群體。再者，這種形態的異化最後成為事實上的某種校園主流文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不易被人覺察的，則是校園文化本身幾個組成部份之間的對抗。其結果有時會使被提倡的價值觀遭到遏制。正像國際教育局在為第四

十三屆國際教育會議所準備的資料中所指出的：「在一個結構具有強制性和專制性的學校中，而學校制度又主要地是在使人更看重個人間的競爭時，民主意識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除了學校中這種正式施教給學生的價值觀與學校的結構及制度的對抗之外，它還強調指出，滲透在學校氣氛中的價值觀必須與學校中正式施教給學生的價值觀相一致（國際教育局，1992）。可見，這裡提及的三者，即學校中由正規課程施教給學生的價值觀，作為潛在課程的學校氣氛，以及學校的結構和制度，有可能出現相互對抗。而且它與上述對抗有顯著區別，基本上為同一個角色的自我衝突。使有關角色承認這一點是不容易的，但又十分必要。

異化的第三種形態可簡稱為挑戰，例如，中國大陸校園文化目前所受到的市場經濟的挑戰，以及不久前的科技進步的挑戰。相比較而言，這種形態的異化顯得更為駁雜。

首先，在這一場合，使校園文化中根本價值觀異化的事主來自需要認真加以識別的教育系統外部。試以最近的一篇報導為例：

據來自權威部門的消息，1993年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報名的熱點專業是經濟、貿易、金融、外語（尤其是英語）、計算機、生物工程等，冷門專業是歷史、中文、圖書館學、物理、地質等，還有師範院校。

教育管理部門有關人士預測：這種趨勢將是全中國大陸性的。

一些中學教師尖銳地指出，現在的學生只有赤裸裸的目標——能多掙錢、容易出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價值觀走入歧途所致（中華工商時報，1993）。

這一報導的標題是「市場經濟也衝出高考？」。

根據社會學的觀點，要了解學生作出學業定向的決定之理由，必須把職業的地位和聲望看作同職業的經濟收益一樣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克勞迪奧，1993）。另一方面，則必須了解學生的志趣、才能等（漢斯格爾特，1985）。前者為外在動機，後者為內在動機。從目前中國大陸高中畢業生作出決定的實際情況來看，說他們

唯有上述赤裸裸的目標，這可能言之過激；然而，無論與社會責任感、個人志趣相比較，還是與職業的地位及聲望相比較，經濟收益在他們作出決定時所佔比重更大，這倒是確實的（參見上文提及的社會學研究所的調查結果）（新聞出版報，1993）。況且，學生中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抬頭（參見上文提及的上海某學院1989年的調查結果），也早於市場經濟作為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正式確立。還應該看到，中國大陸教師的形象在21種全民所有制職業者中被評為最佳，教師的工資在12個行業中卻排在倒數第三，且住房和醫療條件最差（亞太經濟時報，1989）。在上海市，中小學教職工的平均工資收入與該市12個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收入相比，已連續三年（1989年至1991年）居最後一位（上海教育報，1993）。難怪有些教師自我調侃：「前幾年有時窮得斯文掃地，現在往往是斯文不如掃地。」因此，確切地說，衝擊校園文化中根本價值觀的，乃是走入歧途的社會價值觀和日益不公的社會財富分配，市場經濟則為逐利心理的膨脹提供了又一次顯示的機會。

其次，來自教育系統外部的衝擊，往往會發生廣泛而又激烈的文化碰撞，從而成為這種形態異化的又一特徵。近年來出現教師「下海」、學生經商的現象，較集中地體現了這一特徵。大學生經商情況，從表2可見一斑：已在經商者佔20%，加上想經商和表示贊同者共佔受訪者的88%。學生經商，利兮弊兮？部分地區商品經濟發展以後，一些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大量僱傭童工；有些家長為了眼前利益，迫使子女棄學做工、經商或當學徒，因而造成大批學齡少年兒童輟學。這不是爭論的對象。問題在於大學生經商。贊同者認為，這是大學生走向社會，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有力之舉，也是衝破知識分子「君子不言利」的傳統思想的有力之舉。反對者認為，這違背教學規律，經商者是為了滿足其虛榮心或更多的生活享受。誠然，在許多國家裡，據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統計，約有40%的大學生在做部份時間制的工作，但這往往是「黑工」，並非出於經濟上的必需，更不是以經商為主（安德烈，1974）。故不能與中國大陸現在的大學生經商相提並論。此外，對教師經商，也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表三 關於大學生經商

據上海市高等教育局調查，上海市目前在校大學生中，35%的大學生認為成才不如發財。

另據上海市某高校調查：

在經商的大學生	有 20%
想經商的大學生	有 25%
表示贊同的大學生	有 43%
表示反對的大學生	有 12%

共計	100%
----	------

資料出處：轉引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大夏之聲」，
1993年6月20日。

在適應市場經濟需要進行教育改革方面，情況亦然。贊成者認為，應把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作為深化教育改革的契機，以改變辦學思想、辦學模式、教學內容、大學的專業設置等。乃至教學管理制度、人事制度和師資培養。反對者（包括筆者）認為，教育要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但必須謹防教育商品化：

- 教育要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市場經濟的法則、規律是什麼究竟明白了沒有？

- 市場經濟是只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價值規律），還是另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倫理原則和道德觀念）在進行調控？

- 市場經濟有其運作機制，例如賣方和買方是通過協商決定商品的價格的，教育事業中是否具有一般市場的供需關係？伸言之，教育事業有其特殊規律，能完全搬用市場經濟的機制嗎？

- 取單一的市場標準作為教育事業和教育改革的導向，從長遠看這難道不是一種反文明？

- 假設教育事業完全走向市場是必需的，目前的條件是

否已經成熟？

· 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條件下，教育的基本屬性應改變嗎？教育應變為“商品”、學校應變為“市場”嗎？

經過這樣的激盪，校園文化中的根本價值觀最終往往以喪失一部份正確的和更新一部份陳舊過時的，而發生複合式的異化。譬如，面對科技進步的挑戰，有識之士曾清醒地告誡：要警惕伴隨科技發展可能出現的消極道德現象，要遏制現代科學技術危害精神文明的傾向。而市場經濟的負面後果，少說在十幾年前已為市場經濟的國家中一些學者所確認。1982年，國際社會學理事會副總幹事德賈姆奇德·貝赫納姆(Djamchid Behnam)在其「年齡與文化」一文中指出，人們認為，青少年特別是在以市場為中心的大眾傳播媒介對這個年齡段有強烈影響的國家裡，很容易成為時常過份著眼於利潤的文化工業的犧牲品（德賈姆奇德）。最近，國外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就目標、動機、方式及優秀的標準這四方面而言，在市場模式與教育模式之間都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和對立，教育和文明的長遠發展要求擺脫市場的支配（約翰，1991）。這些觀察與分析，無疑僅僅涉及複合式異化中的一個側面。這一側面因常被無意疏忽，倒也有強調的必要。但是，只看到挑戰所產生的負面後果，正像只看到挑戰所產生的正面後果一樣，稱不上冷靜的思考。校園文化中的根本價值觀，在教育系統外部的事主的衝擊下，經歷了激烈的激盪之後，事實上沒有發生過不是正面就是負面的這種臆想之中的單一式異化，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負面後果比估計的要大，正面後果比估計的要小。

從異化三形態的粗略分析，不難看出，「反學校文化」即使只從校園文化的視角予以審視，其內容和涵養也比所謂的「次級文化」、「工人階級子女的文化」要豐富得多。其中有三點是至關緊要的：第一，背離校園文化中根本價值觀的，並非只是校園文化中某個群體，更未必是被視為消極的群體；第二，與校園文化相對的「反學校文化」有多種形態，其共同特徵是部份拋棄校園文化中的根本價值觀，用別的價值觀與之相對抗；第三，「反學校文化」既可以產生正面效應，也可以產生負面效應，還可以產生複合式效應。可以斷言，不應簡單地將「反學校文化」一概視為消極的，現在是應該為「反學校文化」正名的時候了。

概言之，校園文化研究已有長足進展，但迄今尚未就其定義形成共識。今後，宜認真探討構成校園文化的諸要素，並澄清一些誤解。尤其要涉及「反學校文化」，校園文化才能夠立體地得到研究，才能夠得到良性的發展。

參考書目

- 吳修藝(1988)，**中國文化熱**，上海人民出版社。
- 徐新建(1989)，試談校園文化。**教育研究**，第10期。
- 程振響(1989)，校園文化與青年學生的價值觀。**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第4期。
- 劉佛年在全國教育改革會議上的講話(1989)。**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G教育學**，第4期。
- 司馬雲傑(1986)，**文化社會學**，山東人民出版社。
- 姚平等(1986)，「文化」涵義淺析，**上海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
- 鄭金洲(1992)，**文化與教育**，教育學學術研討會報告。
- 孫運時(1992)，從文化角度重新審視教育，**上海教育(中學版)**，第11期。
- 路易·多洛(1987)，**個體文化與大眾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 要力石(1993)，中國社會道德問題慎思錄。**瞭望海外版**，第19期。
- 科學地分析80年代的中國青年問題(1992)。**社會學研究**，第4期。
- 歷史的啓示：時代的號喚——與大學生談談成才之路(1990)。**求是**，第23期。
- 肖川(1990)，**教育與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
- 俞國良(1991)，**校園文化導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馮恩洪(1987)，端正教育思想 建設校園文化。**上海教育科研**，第1期。
- 吳孟明(1987)，建立校園文化生活，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上海教育科研**，第1期。
- 丹尼斯·勞頓等(1985)，**課程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人民教育出版社。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教育局(1992)，**第四十三屆國際教育會議最後報告草案**，法文版。

1994.3
2卷2期
教育研究資訊

- 載維·克萊克萊吉等(1989)，**當代教育社會學流派**，春秋出版社。
- 張人杰(1990)，關於教育方針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浙江教育科學**，第1期。
- 國際教育局(1992)，**教育對文化發展的貢獻**（為第四十三屆國際教育會議準備的資料）。
- 中華工商時報**1993年7月5日。
- 克勞迪奧·德莫拉·卡斯特羅(1993)，世界銀行的培訓政策：使步調一致起來。**教育展望**（中文版），第2期。
- 漢斯格爾特·佩什爾特(1985)，聯邦德國大學生學習動機的差異與職業前途。**歐洲高等教育**（法文版），第1期。
- 新聞出版報**1993年7月17日。
- 亞太經濟時報**1989年6月4日。
- 上海教育報**1993年6月22日。
- 安德烈·利什內羅維契(1974)，改革與大學，**教育**（法文版），3月號。
- 德賈姆奇德·貝赫納姆，年齡與文化，**世界文化政策與世界婦女問題**（中文譯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無出版日期）。
- 約翰·麥克默特里(1991)，教育與市場模式，**教育哲學雜誌**（英文版），第2期。

[張人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